

搭建孫中山研究的新平臺

桑 兵

在起步較晚而進展較快的中國近代史領域，孫中山研究顯得相對成熟。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海峽兩岸競相輪番編輯更加完整的孫中山全集，相關的年譜、長編以及各種資料彙編和史事編年也陸續問世，各種專題論著更是種類繁多，數量驚人，孫中山研究一度成為萬眾矚目的“顯學”。

然而，一番熱火朝天之後，逐漸歸於平靜。社會上雖然不乏關注者，學界也還有堅守人，逢五逢十的紀念持續進行，可是顯學退隱，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長期趨勢。專門從事此項研究者在新進中幾乎無人，即使兼作者也日漸減少。在學位論文和申請課題方面，一般很少選取孫中山為主題。這樣的情形，一方面顯示孫中山研究在經歷了繁榮之後，初創時期進入門檻較低的狀況已經過去，另一方面，則表明孫中山研究要進入摸高探深的成熟期，應該進一步提升研究的平臺，為後來者開闢上升的通道。

與古代史相比，作為近代中國的樞紐性人物，孫中山研究遠遠達不到充分的程度。近年來，孫中山研究雖然總體上由顯退隱，在基本認識和具體史事方面，卻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表明即使這樣的領域也存在巨大潛力和廣闊空間。只是要在既有豐富成果的基礎上摸高探深，必須擴張材料，拓展視野，講究方法。

孫中山風雲際會，常常處於時代漩渦的中心，研究孫中山，可以將近代中國的許多大事要人勾連起來。而研究近代中國的大事要人，如果缺少孫中山的視角位置，就難免偏於一端。如果孫中山研究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缺席失位，則至少不能說是正常的狀態。

為了進一步深化孫中山研究，近十餘年來，我們主要進行了如下各項工作，希望以集眾的形式收穫多方面的大型研究成果和資料彙編，努力搭建孫中山研究的新平臺：

（一）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有系統地廣泛收集書刊報檔等各類資料，為陸續大規模展開各項工作奠定扎實的基礎。同時進行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等相關問題的研究，探討深化拓展孫中山研究的方法和取徑。

（二）組織編輯了十卷本的《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並擬以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上海環龍路檔和漢口檔、五部檔為基礎，編輯續編。

（三）以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為範型，組織編輯了 500 萬字的《孫中山史事編年》（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盡可能吸收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 20 餘年來的新成果，全面蒐羅、耙梳、排比檔案、報刊、日記、函電、書籍等各類新舊資料，善用長編考異之法，前後左右比較參證史料史事，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孫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與此直接或間接相

關的各種人事，大幅度擴充相關史事的內容層面，努力還原歷史的複雜本相，充分展示孫中山作為時代樞紐的廣泛聯繫和巨大作用。

（四）組織編輯《孫中山思想政見各方論爭》，計劃分為影印本和整理本兩種版本。以孫中山逝世和1949年為界，分為三輯，每輯包含書刊報檔各類相關資料，按時序編輯成冊。

（五）將著手展開《孫中山紀念編年》、《辛亥革命與民國肇建紀念編年》以及《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紀念編年》等編年史系列的編撰，將孫中山研究從其生前延伸到身後，全面體現其對於近現代中國的重大影響。

此外，孫中山長期活動於海外，足跡遍及日本、美洲、歐洲和南洋，其他政治流亡者也大都以海外為基地，尤其注重依靠華僑。各地華僑先後創辦過數以百計的中文報刊，不僅大量報導各地華僑及其社團的情況，而且反映各派人士的海外活動。華僑社團和秘密結社以及個人，也有數量龐大的公私檔案，其中多有與孫中山相關的直接記錄。這些文獻有的保存相當完整，有的報刊甚至至今仍然在發行之中，只是由於收藏分散，未經彙集，或事涉機要，秘不示人，使用極為不便。這可以說是孫中山的相關文獻蒐集整理最為薄弱的部分，應當適時著手進行大規模的蒐集整理出版。具體做法，可以先易後難，首先將海峽兩岸收藏的海外華文文獻彙集編目，然後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對美洲、南洋、英國、澳洲等地的收藏機構進行調研蒐集，爭取協助。在彙集整理的基礎上，系統出版所有海外華文各類資料，以推動文獻編輯和歷史研究。

回顧孫中山研究的歷史，海峽兩岸的學人經過多年努力，良性競爭，形成接力式的材料擴充和研究深化，不僅撰寫了多種傳記和大量專題研究論著，而且編輯出版了各種名目的全集、年譜、長編、實錄和資料集。堅持不懈地努力之下，孫中山本人的言論文字已經基本蒐羅完備，關於其行為活動的情形也大體掌握，只是相對於歷史事實的錯綜複雜以及相關資料的極為豐富而言，可以進一步擴充的領域比比皆是。只要轉換觀念，調整做法，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尤其重要的是，儘管直接的材料大體齊備，要想恰當解讀和理解孫中山的言行，仍然並非易事，材料不足，容易望文生義，材料太多，也可能斷章取義。另一方面，近年來其他相關研究的顯著進展，卻發掘出了不少新材料，產生了不少新成果，有助於從兩方面推進孫中山的研究：一是切實瞭解背景語境，有利於深入恰當地解讀和理解孫中山的言論行事；二是深入認識文物制度和大事要人，有利於擴張孫中山研究的範圍和領域。這兩方面相輔相成，也正是搭建高水準孫中山研究新平臺的兩個基礎支柱。

作為研究孫中山的基礎性建設，編輯孫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論無疑至關重要，而要恰當全面地理解其言行，還應該廣蒐群籍，採集與之相關的文字，加以比較參證。所謂相關文字，直接聯繫者大別為三類：一是各方致孫中山的函電，二是與孫中山的政見主張相關的各種意見，三是有關孫中山言行及其相關史事的記述。前者較為明確，其次則包括支持、反對和異議的各方面，甚至延伸到孫中山身後。第三項雖然時間限度清楚，空間的邊際則相對模糊。尤其是要將孫中山放到歷史的整體聯繫之中，而不僅僅以孫中山為軸串聯歷史。循著先易後難的途徑，由編輯函電入手，其他陸續展開。在此基礎上，理解孫中山的文字言論行事，孫中山與各方的關係，以及與孫中山相關的各種大事要人，乃至於把握領悟近代以來中國觀念文物制度的變化，不僅言之有據，而且彼此參證。

史料愈近愈繁，各種記錄，層出不窮，不僅覆蓋史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而且羅生門的現象所在多有。按照自圓其說的標準研治近代史事，誤判亦有證成實事的可能。或以為近代史資料易

得，史事易證。其實恰好相反，由於資料繁多，當事人的記載不一，除了人時地等基本信息外，詳盡再現史事各層面的真反而不易確證。簡單依照時間順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較關於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而近真，亦無法比較前後相連的幾件事而得其頭緒，更不要說理解前人思想言說的本意。

擴張資料之外，還須改進方法。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在方法應用方面，應當借助中古史大家的成熟經驗。其中關於長編考異和比較研究法的各種論述，正是醫治近代史領域材料豐富而梳理不足、問題繁多卻任意舉證的對症良藥。用以俱舍宗治俱舍學的辦法，將前後左右各種不同的材料相互參證，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尤其是依時序綜合考察孫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與各方關係的發生演化，囊括所有材料，勾連貫通，解釋疑滯，將各說整體及部分的真偽異同詳加比勘互證，無論本事還是心路，較由一點一面立論，更易近真且得其頭緒。

宋代為中國史學的最高境界，而近代學術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學方法，正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宋代治史，尤以長編考異之法最為適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講究，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學之說，^①稍詳者如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所說：“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採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蒐群籍，以參證聖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於《論語》有關者，並問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②更為詳盡的發揮，則見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比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並得其頭緒的闡釋。^③

因此，研究歷史人物，不宜只看其人的直接材料，也不能單純以其眼界看周圍人事。若僅就特定對象的言行立論，很容易誤讀錯解其本意本相，甚至以其好惡為是非，結果反而無是非可言。如此這般描述出來的歷史人物，實為研究者心中的形象，與歷史人物的本身貌合神離，似是而非。必須比較參證前後左右上下內外的各事各說，才能將人物置於歷史本來脈絡的適當位置，理解把握其言論文字的本意和行為活動的本相。近年來孫中山研究的切實進展，往往並非專門研究孫中山而得，而是由其他相關研究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穫。若是單就孫中山的言行反復解釋，反而如陳寅恪對民國時一般文化史著述所批評的那樣，很容易流於只抄舊材料或僅就舊材料作新解釋，非滯即誣。

編年體的人物研究當然要以譜主為樞紐，但是凡涉及相關的思想言論人事，應盡可能多角度呈現歷史的複雜本相。孫中山研究的編年系列不僅僅以孫中山為軸心串聯歷史，不僅關注孫中山本人的言行，不僅從孫中山的角度考察其與同時代人、事的關係，也不僅從孫中山的視角來看待其所經歷的一切大事要人，而要將孫中山放到歷史的整體聯繫之中，依時序綜合考察孫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與各方關係發生演化的全過程各方面，從而進一步夯實孫中山研究的基礎，深入理解孫中山的文本言論行事、孫中山與各方的關係、與孫中山相關的各種大事要人，乃至於把握領悟近代中國觀念文物制度的變化，為孫中山研究這類相對成熟的領域提供進一步摸高探深的實例，不但可以提供進一步深化孫中山研究的堅實支撐和有力憑藉，而且能夠充分展示孫中山作為時代樞紐的廣泛聯繫和巨大作用，進而推動整個近代中國研究的全面深化。

通過上述工作，可以進一步系統梳理孫中山的言行及其與各方關聯，打造高度與深度相輔相成的研究新平臺，為進一步深化孫中山研究提供堅實支撐和有力憑藉，確立檢驗各種研究和評價

孫中山的衡量尺度。通過彙聚梳理各種史料史事，訂正誤說，縮小歧見，保存異解，實事求是，不溢美，不附會，不趨時，為學術界和全社會提供全面認識孫中山以及近代中國的憑藉和保障，防止隨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的瞎說，成為檢驗神化和妖魔化的試金石。同時，在深入認識近代中國的社會變動、制度建構、思想脈絡乃至中外關係的基礎上，使得理解孫中山的言行與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風雲變幻相輔相成，促進近代中國研究的深入發展。

與孫中山研究貴為顯學的時期相比，最大的差異，還不是成果的多少，而是研究者的聚散。原來不僅有一批能力相當強的學人專門從事孫中山研究，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盛極一時，以及三次革命高潮說的互為聯繫，投入相當一部分精力兼作孫中山研究者為數更眾，從而保證了成果的質量和工作的持續。搭建新的平臺，使孫中山研究站上新臺階，並不意味著這一領域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新平臺具有的開放性，就在於所提供的資料和路徑，可以保障後續工作的持續展開，並隨著研究的陸續推進，不斷充實加強和拓展平臺的建設。

為達此目的，聚人為第一要義。沒有源源不斷的後續力量，孫中山研究就不能持續發展，有序推進。集眾式的研究，在人文學科未必是理想的形式，可取的方面之一，就是訓練人才。而人才的培養，最重要的是基礎性和基本性的訓練。只有本宗扎實，根本確立，才能以不變應萬變。通過集眾的研究，可以為孫中山研究保留必要的種子和培訓適當的骨幹，使之能夠薪火相傳，先因後創，溫故知新，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幫助參與者揣摩掌握長編考異之法的精妙，能夠熟練應用，具備長編考異的底蘊基礎，轉治其他專題，效果大不相同；促使研究者打破分科的局限，跳出專門的窠臼，多頭並進，相互貫通，提升治學的境界。如此，研究孫中山和研究近代中國各類重大問題不僅可以並行不悖，還能夠相輔相成。

①據說歐陽漸治俱舍學，三年不成，後於滬上遇沈曾植，沈告以不要治俱舍學，而要治俱舍宗。歐陽漸回到南京，尋找俱舍前後各書以及同時他家諸書讀之，結果三個月就燦然明白俱舍之義。這一典型事例顯示，即使近代佛學界堪稱大師級的高人，也不能直面文本領悟內典的精義，必須前後左右比較研讀，才能異同自見，大義頓顯。參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3頁。

②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

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1年，第262～263頁。

③詳見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文字有所調整。

（作者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孫中山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